

沈渭滨 姜鸣 著

上海谭

阿拉上海人——
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上海谭

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宣圆 主编

阿拉上海人 ——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

沈渭滨 姜鸣 著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(沪) 新登字 202 号

上 海 谭

阿拉上海人——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

浦东——新上海的一半

五角场——“大上海”的兴衰

会馆街——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

乌泥泾——绫布二物，衣被天下

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宜圆 主编

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国权路 579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竞成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.5 本册字数 73,000
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300

ISBN7-309-01038-8/G·172

全 五 册

定价: 24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上海谭》为刻画上海社会生活风貌的小型书系，由《阿拉上海人——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》、《浦东——新上海的一半》、《五角场——“大上海”的兴衰》、《会馆街——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》、《乌泥泾——绫布二物，衣被天下》五册组成。每册选取一个视角，依据史实，勾勒近代以来上海人与上海滩的典型状况，叙述生动，多有新见。对于本地的民情风物，“谭”得贴切而有趣味。全书不仅地方色彩浓郁，而且充分展示时代气息，可适应机关、企业和学校等各界读者的需要。

责任编辑 仁 人

封面装帧 郑 群

责任校对 张利勇

目 录

- [1] 一 一个非籍贯性的称呼
——文化意义超越地域观念
- [1] 古代没有“上海人”
- [5] 近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
- [10] 神州处处有“阿拉”
- [14] 入与出的启示
- [20] 二 “洋装瘪三，自己烧饭”
——市民生活方式面面观
- [20] 衣：追慕时尚，独领风骚
- [24] 食：既想吃好，又要实惠
- [29] 住：石库门里“七十二家房客”
- [35] 行：马路上的“交响乐”
- [42] 心态：希望与困惑并存
- [48] 三 现代文明的映照
——上海人的价值观念

[48] “只认衣衫不认人”

[53] “崇洋不媚外”

[58] “上只角”与“下只角”

[65] 在“出国热”背后

[71] 四 锱铢必究的“生意经”

——上海人的商业意识与创造力

[71] “做生意门槛精”

[78] 金钱生金钱

[83] 大场面与小算盘

[88] 在竞争中表现自我

[94] 五 劝君莫谓阿拉“刁”

——上海人的性格与情操透视

[94] “头子活络”和小聪明

[99] 好奇心与“轧闹猛”

[102] 安居乐业的“小乐惠”

[106] 不擅“侃大山”，却爱“轧三胡”

[111] 六 追求新奇，超越传统

——上海人的文化情趣掠影

[111] 海上游子爱乡音

[119] 滑稽何以受欢迎

[123] 艺术新潮的弄潮儿

[129] “卡拉 OK”=自我陶醉

[133] 七 不是结束语

— 一个非籍贯性的称呼

——文化意义超越地域观念

古代没有“上海人”

上海，这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，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祖国的东海之滨。它以发达的工商业、繁华的市容、巍峨的建筑、密集的人口，曾博得过“东方第一大都会”的桂冠，至今仍令那些怀有几许失落感的上海人引以自豪，也使不少观光的“老外”、省亲的侨胞流连忘返。

对比于古老的国土，上海无疑是非常年轻的。在公元四世纪以前，娄塘、嘉定、南翔至莘庄、南桥一线即历史学家称之为“冈身”的那个区域以东，基本上还未成陆。直到十二世纪，海岸线才生长到里护塘——今日川沙、惠南、大团、奉城一带。到元代的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，上海设县，就是今天纪念建城七百周年的肇始。

从地域意义上说，生活于古上海县治里的先

民当然都是上海人。但是，他们在作自我介绍时决不会像当代上海人那样眉飞色舞地说：“阿拉上海人”。这不仅因为“阿拉”这句方言直到晚清才成为上海人的口头禅，而且因为设县前的上海，只是华亭县属的一个小镇；设县后的上海，又长期隶属松江府。在封建闭塞的社会结构中，聚族而居的乡村和经济不发达的城镇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，只有那些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城市，才具有向周边幅射自己能量的张力。所以，尽管自宋代至清初，上海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上升，但仍未能超出它的府治的影响和控约。他们充其量只会说：“鄙人祖籍华亭县”；或者说：“在下松江府上海县人”，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卖狗皮膏药的山东汉子抱拳拱手地自称“小的山东济南府人氏”那样，必须抬出一个比自己籍贯地知名度更高的城市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古代没有“上海人”。

“上海人”是一个文化意蕴超越地域观念的称呼。举个例子就可明白：按地域意义说，今天的上海县是古上海县的主要部分，那里的农民应是标准的上海人，但他们若到南京路去，往往说“到上海去”；而城里人到了上海县的三林塘，农民说：“上海人来了”，“去看上海人”。那些老实巴交的本地农民并不认为自己也是上海人，而城里人则轻蔑地称他们为“阿乡”，断乎不会将其称作

“上海人”。

仅仅用上海城区居民来界定“上海人”，也不完全准确。但只要上街乘一趟公共汽车，看他能否猿猴般灵巧，黄鳝般滑溜地挤进车厢，然后招呼售票员“一张一”（“买一张一角钱的车票”），你就可以迅速地取得一种心理认同。这种认同，用某个作家的话说，就是“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，说得响亮一点，可以称之为‘上海文明’”。

说到“上海文明”，马上使人联想到“海派文化”。它源自上海画坛，扩展到戏曲、电影、小说、美术教育乃至整个文化领域，从而形成一种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：追求时尚，勇于创新，富有竞争性和进取心。这种文化，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化那种田园情趣和生活方式相比，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。它在上海生成，同上海人的精明、灵活、实惠、自尊、善学习、赶时髦等特点极为契合和适应，因而相互补充、共同发育成长。

现在很难说清，超越地域观念的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“上海人”究竟形成于何时。就像长江泥沙积淀成陆，需要有个漫长的过程。但它的上限不会在鸦片战争以前，因为作为近代都市，上海是在战后才从一个埠际县城逐渐跃居为中国最大

的外贸内运中心的；它的下限不会超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因为那时的上海已真正发育为近代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大会。

从上海开埠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这悠悠的八十年岁月中，一方面是人在改造着城市，另一面也是城市改造着人。随着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一条条驰骋汽车的沥青马路筑成，一家家商行、一个个工厂的设立，上海终于走出了中世纪城镇的格局；居民也日益受到近代商业风气和都市文化的影响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自身的素质。于是，传统的田园文明让位于新兴的工业文明，农村制约城市逆转为城市制约农村。人和城市差不多同时完成了自身的异化过程。如果以二十年作为一代计算，当爷爷在上海开埠时作为一个县城居民，尚未达到都市人的标准，那么他的孙子就有资格可以逢人便说：“阿拉上海人”了。

精确一点说，文化地域学意义上的“上海人”比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要形成得稍晚些。除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因外，还有上海如何在行政区划上突破县级城市的地位这个因素。1925年以前，上海尽管已经完成了近代化而成为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，但它仍然作为江苏省的一个县而与嘉定、青浦、川沙等并列。直到这年6月，上海才作为淞沪特别市，使其地位超擢出来。但首任市

政督办孙宝琦并未到任，继任者郑谦也没有到督办公署主持工作，使得公署徒有其名，上海也因此未能“特别”起来。1927年，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改上海为特别市，从此，上海才真正摆脱县级单位而有了上海市的名称。这时候，“阿拉上海人”不仅以都市人的文化内涵，而且以都市人的真正地位受人注目了。所以，令“阿拉”们扫兴的，不仅上海是一个年轻的城市，古老国土上的晚辈；而且“上海人”至今也只有七十多年的历史，更是古老中国的一个晚辈。

近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

祖籍北方的女作家陈丹燕，孩提时随父亲来到上海，心中怀着对上海的警惕，因为哥哥正告诉她：“上海是个庸俗的地方”。后来，她长大了，发现周围许多上海人朋友其实都不是本地人。而她本人，尽管怀抱着外乡人的信念，却在黄浦江风的熏陶下，学会了上海话，穿起上海流行的时装，嫁给一户说上海话的人家做媳妇，甚至对拥挤的交通发出“外地人不要再来添乱”这种纯属上海人的怨言。结果她问：“谁是上海人？”

生活在上海的居民，一旦到了外地，不论他祖籍何方，操着何种口音，逢人便说：“阿拉上海人”。这句话仿佛是在自报家门，流露于眉梢的

却是都市人特有的尊荣感。其实，在十个“阿拉”中，至少有六个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如果再寻根究底，那另外四个恐怕又有一半难说是世代居住在上海的“老土地”。所以，在那些见过世面，或者熟知掌故的外地人心目中，“阿拉上海人”这句话，早已失去了籍贯上的意义，只有文化上的认同。

“上海人”确乎大多是外地人。统计资料表明，上海全县的人口，1852年为54万，1949年3月全市人口为545万，97年中增加了491万，足足扩张了9倍多。近代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高，上海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35岁。市区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显然不是自然增长所致，而是外地人的不断涌入。一方面，由于政治动荡、战乱不断，使许多被战争波及的外地人拖儿带女地举家迁入相对稳定的上海，尤其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、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件和内战时的1947—1948年三个时期为移民高峰；另一方面，上海作为旧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都市，对周边地区一直产生着强烈的吸引力，一道道看不见的磁力线，既诱使富人将资财投进这十里洋场，也给破产的穷人带来淘金的憧憬。于是，随着越界筑路和租界的不断扩张，城区拓展出一片片石库门、新式里弄和花园洋房，在城郊和边缘区，则出现

了大量肇嘉浜、番瓜弄一类的贫民窟。

《子夜》里的吴老太爷，带着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乘“飞云”轮船从苏州乡下来到上海，他自然算不得上海人。但他的儿子吴荪甫，却肯定可以称作上海资本家。旧上海的实业家大多属这种类型。譬如荣家来自江苏无锡，郭家来自广东香山，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主要来自浙江。上海的资本家团体上海总商会，其主要职员绝大多数是外地人。以 1916 年上海总商会第三届董事会为例，全部 35 名成员中，浙江籍共 18 人，江苏籍 14 人，广东籍 2 人，江西籍 1 人。在 14 个江苏籍人中，上海本地人只有苏筠尚（本炎）、顾馨一（履桂）、叶鸿英（遼）、姚紫若（曾经）、郁屏翰（怀智）5 人，其余或为无锡、吴县，或为嘉定、常熟人。这些外地籍的资本家如浙江的朱葆三、沈联芳、王一亭、傅筱庵、虞洽卿、钱达三、张乐君、周金箴、杨信之、陆费伯鸿，广东的唐露园、劳敬修，江西的陈润夫等，都在上海的土地上创业、繁衍，取得了上海人的资格而入选总商会的领导机构，作了上海体面资本家的代表。

文化界也是如此。无论小说家、报人还是社会科学家，乃至大学教授、戏曲演员，细细去统计，恐怕很难找到几个本地人。《三十年代在上

海的“左联”作家》一书所记载的 67 位作家中，没有一个原籍是上海的。然而，他们一旦出了名，在别人的眼中便是上海的化身。来自山东的蓝苹，在十里洋场不过呆了几年，去延安后，人人都把她看作上海女明星，直至几十年后还被视作“上海帮”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

根据 1950 年对上海人口籍贯的调查统计，构成上海市民主体的是江浙两省人。其中江苏人占 48%，浙江人占 26%，而上海本地籍屈居第三位，占 15%，再次是广东人、安徽人、山东人，分别各占 2% 左右。外地人数量之多，使得许多行业的从业人员往往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，而众多的会馆和同乡会，常常都是按县设立的。

说到会馆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，会馆之多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从文献记载看，清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 年）建立的商船会馆，似乎是上海最早的一所会馆。随着工商业日盛，会馆、公所也因外来人口的激增而不断增加，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时，有名可按的会馆、公所已达 124 个，实际上可能不止此数。按省份统计，上海的会馆有：

浙江	10 个	江苏	8 个	广东	5 个
福建	3 个	山东	3 个	安徽	2 个
江西	1 个	湖北	1 个	湖南	1 个

四川 1个 山西 1个

当时全国 18 行省，在上海就有 11 个省的外地人建立了会馆。其中著名的会馆如：

广肇会馆，代表广东人；

揭普丰会馆，代表广东揭阳、普宁和丰顺县人；

潮惠会馆，代表广东潮州（汕头）和惠州府人；

泉漳会馆，代表福建泉州、漳州人；

三山会馆，代表福建人；

徽州会馆，代表安徽人；

宁波会馆，代表浙江宁波人；

绍兴会馆，代表浙江绍兴人；

苏州会馆，代表江苏苏州府人；

江宁会馆，代表江苏南京人；

京江会馆，代表江苏镇江府人；

钱江会馆，代表浙江杭州人；

江西会馆，代表江西人；

山西会馆，代表山西人；

蜀商会馆，代表四川人。

这些不同地域的会馆以乡土情谊相纽带，相互间保持着和平共处的人际关系，但各自又有不同的习惯、风俗乃至经济上的利益和追求，这就使上海这个大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

社会。

大量移民的涌入并在上海繁衍生息，不仅使上海人口密集，而且使它在风格上和文化上具有包容并蓄的气度，较少守旧排他劣习，富有勃勃生机和进取精神，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；同样，移民中含有大量流民，也造成帮会势力发达和秘密结社盛行，使得上海一度成为全国黑社会势力最坚挺的城市。移民带给城市的正负效应在旧上海都是最为典型的。

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激烈竞争和拼搏厮杀，一方面造就出上流社会的众多富翁，他们出手豪阔，翻云覆雨，气度恢宏；另一方面也使得普通市民养成察言观色、利己本分、随遇而安的心态。这些优点和缺点，糅合着三山五岳各色人等的不同特征和不同追求，犹如闪烁的钻石，是一个复杂的多面晶体，值得人们从各种角度去细细品味。

神州处处有“阿拉”

本来，上海话的第一人称代词是“侬”或“阿侬”，后来受到大量来沪的浙江人方言的影响，逐渐演化为“阿拉”。如今，“阿拉”成了上海话中最出名、最常用的词汇而被广泛使用。据说，不少“老外”在上海学习上海话，第一句学的就是

“阿拉”。随着上海人走遍全国，“阿拉”之声也就响遍神州大地了。

到处都有上海人。漫步北京王府井大街，看到高悬的金字招牌“中国照相馆”、“蓝天时装公司”、“中央洗染店”，那都是五十年代从上海迁京的名店。当年的老职工，现在恐怕多半回家安享晚年了。驱车大西南，在云、贵、川的崇山峻岭中，一个个规模宏伟的国防工厂，大多是六、七十年代一骨脑儿从上海迁去或包建的，职工中上海人占了很大比例。电影《年青的一代》中，具有典型上海青年特征的林育生，在长辈教育和同伴感召下，告别都市生活，踏上艰难曲折的地质队员之路。这一文学形象，在那个时代是很有代表性的。新疆的石河子、阿克苏，黑龙江的完达山、兴凯湖，云南的西双版纳、瑞丽江畔，到处都有上海知青洒下的汗水。上海输出的工业技术人才、商业服务人员、文教卫生方面的专家学者、新闻出版行业的记者编辑等等，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从1949年到1983年，上海市区净迁出口口总数达到257万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：成千上万的外地移民涌入上海后，用不了几年便一个个变成了“上海人”，而当他们离开上海，浪迹天涯后，就再也洗不掉“上海人”的印记，难以再同化